

「發展中國家」或「大國」？ 中國國家身分的共存與使用情境

許 家 豪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助理教授)

任 軒 立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傳播學院博士生)

摘要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提昇，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對於自我身分的定位已經從以往的「發展中國家」，慢慢地往「大國」傾斜。有些學者推論這個轉變更接近一個階段式的典範轉移，但同時也有許多文獻主張，這兩個身分常常以某種形式交融在一起。中國對自身的自我定位到底實際情況如何？又為何得以發生？這些困惑是本文的出發點。本文使用量化的電腦輔助文本分析建立主題模型，並搭配質化的概念分群和案例分析，分析中國 2001 年至 2019 年的外交部發言人講話。主要發現有三：(1) 在經驗上驗證了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確實共同存在；(2) 建構出中國兩個身分的特徵框架；(3) 觀察到並擴展中國使用不同身分的時機和情境。基於以上發現，在未來我們將可以更好地判斷中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採用何種身分，對該身分框架出的有限行為做出合理的回應。同時本文也認為，既然中國擁有在不同情境下展現不同身分的彈性與需求，意味著兩個身分並存的情形在可見的未來很有可能延續下去。

關鍵詞：中國外交、國家身分、電腦輔助文本分析、主題模型

* * *

DOI: 10.30389/MCS.202112_64(4).0004

壹、前言

2008 年常被視為中國國力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經歷全球金融風暴、北京奧運的盛大舉行、中國 GDP 超日趕美後，宣告著中國的對外態度、目標以及行為出現了轉變。中國態度是否轉趨強硬成為學界爭辯的話題（Johnston 2013; Chen et al. 2014; He and Feng 2012; Suzuki 2014），從學界討論來看，普遍認為中國外交目標從「和平發展」轉變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新型大國關係」是有目共睹的（阮宗澤 2020; Zeng 2016; Hao 2015），其外交策略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也已成定論（朱鋒 2008; 王緝思 2011; Yan 2014; Wang 2019）。

這些外顯的變化似乎都在暗示著一個更深層的身分轉變正在發生。依據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理論，一個國家的身分與其國家利益和對外行為是相關的（Wendt 1999; Allan et al. 2018; Vucetic 2017）。我們可以輕易地觀察到中國這個國家行為體的外在行為變化，但是要推測其國家利益的轉變、甚至是更幽微的自我定位與身分轉化並不容易。儘管如此，身分的轉化與否卻至關重要，因為相對於外顯行為的轉變，身分的轉化雖需要時間醞釀卻也是相對穩定的，深層的慣性要在短期內改變並不容易。

近年來，Shambaugh（2011）、李少軍（2012）和 Zeng and Breslin（2016）都觀察到，與外顯行為的變化同步，中國的國家身分處於模糊、不連貫甚至衝突的狀態，且這個不穩定的身分樣態是由「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兩身分所組成，暗示著老牌的發展中國家身分到新興的大國身分的轉型已經悄悄地開始，只是我們仍不曉得這個程序進展到什麼階段了？中國已經徹底地自認是一個大國，還是仍處於一個青黃不接的過渡狀態？又或是這個過渡狀態正是中國自我認知的新常態？在這個過渡狀態或新常態中，中國又會在什麼時機或情境下展現出什麼樣貌？

貳、「發展中國家」與「大國」：衝突的概念？

一、從「發展中國家」到「大國」的語彙轉換

「發展中國家」是 1949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以貫之的自我定位，建立在由毛澤東發想、被鄧小平繼承的三個世界著名論斷之上。三個世界包含由美國和蘇聯組成的第一世界、由西方發達國家組成的第二世界，以及由廣大的由亞非拉發展中國家

組成的第三世界，中國認為自己理所當然且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鄧小平 1974; 鄧小平 1993）。發展中國家這個身分的內涵包含兩個層面，分別對應鄧小平所提出的兩個時代主題：和平與發展。和平層面是國際層次的，廣義地來說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反霸特質，拒絕霸權的壓迫、也拒絕壓迫別人（陳和香 2014）。發展層面則是國內層次的，指的是對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的科學認識，必須堅持走一黨專政的基本路線（趙紫陽 1987）^①。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以及相關的論斷隨著鄧小平理論在中共十五大後被寫入黨章，被隨後的領導者江澤民、胡錦濤，以及習近平所繼承。事實上，在官方意識形態中，一直到 2049 年前，中國都不會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任務，因此會一直停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身分框架之內（習近平 2017）。

雖然如此，自 1990 年代開始，中國被稱為或自稱為「大國」的頻率開始上升。例如，從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開始出現的「負責任大國」（responsible great power）稱呼自十八大起被納入大會報告（吳兵 2015; Boon 2018），「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和「新型大國關係」成為習近平時代的外交主軸（王毅 2014; Hao 2015; Shambaugh 2020; Freeman 2020）。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在 2013 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超過六成的中國民衆以及超過八成的中國精英認為中國應該在世界扮演領導者的角色（Swaine et al. 2013）。上述跡象顯示，大國的身分自千禧年開始慢慢在中國群眾以及精英中成形，但是，這個大國身分的內涵到底是什麼？Zeng 和 Breslin（2016）對中國國內學界如何看待大國這個身分做了有系統的分析，發現雖然中國內部對於中國已屬於大國已有共識，但是對於這個身分的責任義務、與他國互動的方式，以及行為的規範都莫衷一是。換句話說，中國認為自己是個大國，但這個大國身分的邊界仍然是模糊的。

雖然我們無法單單透過「大國」概念本身去形塑其身分輪廓，但是我們發現，在諸多文獻中，「發展中國家」的身分經常被與「大國」身分併置討論甚至作為對比，因此我們對此二身分的關係產生濃厚興趣。Zhao（2015）認為，這兩個身分代表著中國在國際間的相對力量（relative power）排序，當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自稱時，代表自認與發達國家有一段差距，反之，當它以大國自稱時，則代表自認擠入

註① 按中共十三大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所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指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前的不發達狀態，主要特徵包含農業比重高、市場化程度低、貧困人口高、地區發展不均衡等。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則有說明，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

有影響力的強國之林。同樣地，Wang（2019）在談論習近平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概念時，點出這是中國感知自身在國際環境下的地位提昇後的一種倡議，對應到更有所作為的外交表現。Wu（2001）則說，中國在千禧年初是以發展中國家的國力想做大國的事，兩個身分最主要的差異是在國家利益的涵蓋範圍，發展中國家關注的重心在國家內部和周邊，大國則是放眼區域和全球。李少軍（2012）的看法相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基本上是內向的，追求自身的經濟發展，主動權在自己身上，相反地，大國的身分則是外向的，必須關注全球層次的議題，並與其他權力中心互動^②。

總結學界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的兩項最明顯差異，一是結構現實主義語境下對相對權力大小認知的不同，另一則是在建構主義視角下由國家身分演繹出的國家利益的不相容。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建構主義，我們都可以發現中國的這兩個身分是有明確分野的，不管是身分概念本身，還是基於身分衍生出的利益和行為皆不相同。

二、「發展中大國」：身分的共存

雖然說發展中國家與大國這兩個身分在概念上是有差異、甚至不太相容的，但是在中國的官方論述以及學界研究中，此二身分卻沒有被刻意迴避。首先，中國在

註①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作者並不認為中國外交僅能使用「大國」與「發展中國家」這兩種身分分類。事實上，蒲曉宇在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的第三章中也舉出了中國六個可能的國家身分：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country）、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崛起中的勢力（emerging or rising power）、大國（great power）、準強權或強權（quasi superpower or superpower）以及區域勢力（regional power）（Pu 2019）。作者也認為蒲氏所提之分類方式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但作者之所以採用「發展中國家」和「大國」作為本文研究框架有幾點原因：（一）「發展中國家」與「大國」是一個已經在學界中已經累積相當文獻，並且被廣泛設定的分析框架。而本文之設定目標乃作為與既有文獻對話，並且嘗試使用不同研究方法進行拓展與補充，因此並非刻意忽略其他可能的國家身分；（二）蒲氏「地位訊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透過人工選擇後的資料進行論證與鋪陳，並無法排除選擇性偏見的問題，而本文所使用的「電腦輔助文本分析」方法則有效的排除主觀選擇的問題，透過關鍵字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的正式發言來驗證地位訊號的動態。是以，本文是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從而對中國在對外釋放的地位訊號給予堅實的實證基礎，兩個方法各有其優劣之處；（三）本文研究方法之主要缺陷是，因為必須控制變項，所以不宜在檢索關鍵字詞階段輸入過多詞，避免因果推論之混亂。因此本文將焦點放在「發展中國家」與「大國」兩個變項上，並不意味著作者排除或否認中國外交上有其他地位訊號。本文作為應用此研究方法研究中國外交地位訊號的探索性研究，未來可以繼續探索其他中國對於自身身分地位的理解，例如中國對於自身是「區域勢力/國際強權」兩個概念的強弱以及歷時性變化。作者要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之一對這個問題的提醒。

2008 年後雖然時常自認為是一個大國、也普遍在國際環境中展現出大國的樣貌，但是有時仍然會拒斥一些外界施加的大國頭銜，或是持續地釋放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的訊號。例如在 2009 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在歐盟 - 中國峰會上拒絕了與美國平起平坐的 G2 概念，並再次強調世界的事物不能被少數幾個大國所決定，必須回歸多邊機制（Xinhua 2009）；另外，在中共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報告中，都一再強調身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必須「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胡錦濤 2012；習近平 2017）。可見，「發展中國家」與「大國」兩身分在時序上並沒有被明顯區隔開來。

其次，「發展中大國」這個結合兩身分的詞彙常常在各種場合以各種型態出現，例如「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等等（羅建波 2014；雷建鋒 2019），想強調的無非就是中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一方面必須根植於官方主旋律所強調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卻又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雖然如此，這些加上形容詞並結合兩個不相容概念的新詞彙，其實並沒有真正讓兩個身分融合起來，往往僅是條列式地或是階段論式地將兩個身分概念分開來討論，卻不觸及兩者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在結論上更是僅選定強調其中一個身分的特質，不是強調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現代化的任務（偏向發展中國家），就是強調中國在國際上應有更大作為（偏向大國）。由此可見，不僅在時序上，甚至連在概念上中國都沒有避諱兩個身分同時出現，唯現階段仍僅停留在將兩身分機械式地並列而非有機地融合。

那麼，為何概念上不太相容的「發展中國家」和「大國」這兩個身分得以同時存在呢？有學者試圖以地位訊號理論（status signaling theory）來解釋（蒲曉宇 2014；Pu 2019）。蒲曉宇認為，中國之所以有時釋放出較高的地位訊號（大國），有時又釋放出較低的地位訊號（發展中國家），是因為中國面對多重觀眾（multiple audience），也就是中國必須同時面對國內觀眾以及國外觀眾，對國內觀眾要釋放出大國的訊號來滿足民族主義、翻轉國恥的期待，以及建立執政合法性，對國外觀眾則需要釋放出發展中國家的訊號來規避國際責任、減少中國威脅論，以及維持南南合作。由於訊號釋放時中國難以掌控其觀眾，因此才會出現讓外界混淆的不連貫情況。對蒲曉宇來說，不同觀眾是中國展現不同身分的機制。

三、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根據前述文獻，本文的研究問題有二。第一，中國目前自我認定的身分為

何？是發展中國家還是大國？或是處於兩者並存的狀態？先前關於此問題的討論都預設了一個階段論的二分法前提，認為中國不是還處於發展中國家的狀態就是已經轉變成大國，這種階段論同樣存在於對中國外交行爲（從韜光養晦到有所作爲）和外交態度（語氣是否變得更加強硬）的爭論中。但是這個前提已被經驗上的證據挑戰，因為中國不只同時釋放出兩身分的訊號，更有將兩身分合而爲一的嘗試，這也使得二分法較難站得住腳。

檢驗完第一個問題後，若如階段論者所說，中國自我定位的身分是很明確地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爲大國，則由於兩個身分沒有重疊，身分衝突的問題也就不存在；反之，若中國同時擁有此二重身分，無論這是一個過渡的狀態或是永久的狀態，我們都必須提出第二個問題：中國在概念上不太相容的兩個身分如何得以共存？是否如蒲曉宇所言，會在不同的時機與情境下展現出不同的樣貌？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電腦輔助文本分析（computer assisted text analysis），用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建立模型來提取文本中隱含的主題（Blei et al. 2003）^③。LDA 假設一群文本之中包含若干個主題，每個主題由若干個字詞組成，藉由字詞與字詞的關係（是否出現在同一文本之中），LDA 可以判斷哪些字詞應該被聚合成一個主題。LDA 分類的方式不是判斷某文本屬於哪一個主題，而是判斷該文本含有哪些主題，每個主題在一個文本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LDA 的分析對象是所有的文本，避免了人爲選擇的偏誤，因此讓研究者擁有相對客觀的基礎去判斷一群文本中的特徵^④。執行上可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是斷詞以及前處理，第二是建立模型。首先，本研究使用 Jieba（結巴）中文斷詞系統^⑤，將每個文本轉換成文字群（bag of words）並建立字典（dictionary），再來進行一系列的前處理，包含刪去字詞表^⑥、自建字詞表^⑦、去除單字、詞性控制、極端值^⑧等。接下來開始

註③ 同樣採用此研究方法的有 Catalinac（2016）、Chen 和 Hsu（2018）和邵軒磊（2019）等。

註④ 這種由下而上（bottom-up）尋找文本群中特徵的研究方法，其邏輯特色是經由「資料引導」（data driven），進而透過歷時性的檢證，發現在一般即時性研究中所不能察覺的長時段變化，與傳統由上而下（top-down）設立明確問題意識的方法有所區別。

註⑤ Jieba（結巴）中文斷詞系統的程式碼來源：<https://github.com/fxsjy/jieba>。於 2019/10/15 取用，最後拜訪時間爲 2020/10/27。

註⑥ 本研究使用之「刪去字詞表」請見附檔一：<https://bit.ly/2KDiuVk>。

註⑦ 本研究使用之「自建字詞表」請見附檔二：<https://bit.ly/2KDiuVk>。

註⑧ 本研究僅選擇動詞、名詞、形容詞以及副詞，並刪去出現少於 10 次的詞、太過頻繁出現的詞（出現在超過一半文本），篩完後，再選取前十萬個最常出現的詞。

建立主題模型，本研究採用 Mallet 演算法^⑨，並以一致性分數（coherence score）決定要採用幾個主題。主題數量是建模前需要指定的參數，一致性分數愈高的主題數量會產生愈好的結果（Röder et al. 2015）^⑩，最終本研究在「發展中國家」以及「大國」兩組模型上都採用 8 個主題^⑪。模型建立之後，就會產生主題的編號以及與該主題對應的關鍵字集合，但是 LDA 並不會告訴我們那個主題的意義為何。因此，接下來就需要倚靠研究者賦予主題意義，瀏覽主題含量最高的若干筆文本以判斷該主題的實質內容為何，以本研究為例，我們將閱讀某主題中占比最高的十筆文本以將主題內容立體地描繪出來，然後才做進一步的分類與分析。

本文的經驗資料來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講話，包含例行記者會和對特定問題的書面回覆，採用一問一答的形式，先由記者提問，再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答^⑫。在我們的資料中，同一天有許多份文件，同一份檔內有許多問題與回答，本研究將每組問答分割出來並刪掉提問後，一個回答成爲一篇文本。資料抓取時段爲 200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止，共 46,294 筆，包含這段時間內的所有回答紀錄^⑬。獲取了所有的發言資料後，接下來我們在所有文本之中選取含有「發展中國家」的 638 筆文本以及含有「大國」的 527 筆文本，並以此兩群文本作爲我們進一步分析的材料（只要指定字詞有出現在文本的任何一處該文本就會被選取，兩群文本分別占總文本的 1.38% 及 1.14%）。

接下來說明兩個與資料相關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爲什麼可以使用外交部

註⑨ Mallet 演算法程式碼來源：<https://radimrehurek.com/gensim/models/wrappers/ldamallet.html>，於 2019/10/15 取用，最後拜訪時間爲 2020/10/27。

註⑩ 一致性分數使用的概念是語義一致性（semantic coherence），但是因爲沒有考慮到排他性（exclusivity），所以會碰到相同詞彙頻繁出現在不同主題的問題，某些標準綜合了以上兩概念以解決此問題（例如 FREX），詳細說明請參考（Roberts et al. 2019）。

註⑪ 本研究計算後得到「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兩組文本的一致性分數結果請參考附檔三：<https://bit.ly/2KDiuVk>。

註⑫ 作者很清楚知道，放上網路的公開資料都是經過中共官方篩選過的，一些不被官方認可的問題，或是現在立場已經有變化的回答都不會被放上去，問題和回答也都有可能經過潤飾甚至修改。但本研究相信這樣的資料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原因如下：中共對於官方檔案的公開極爲慎重且具有權威性，如此經過篩選的資料，反而更能夠代表真正的官方一致立場。除非有重大意識型態變動（例如文化大革命），才會發生已發出檔案被收回或隱蔽的情況，就如同我們不需擔心鄧小平時代後中國歷屆黨代會的報告會被修改一樣。

註⑬ 中國外交部最早開始建制化地記錄這些資料是 1997 年，但是出於不明原因，資料整理的品質較爲凌亂，包含篇名和紀錄格式不統一、文本重複出現等等。就本研究目的來說，最嚴重的問題是，在詳細比對之後發現，2001 年以前的文本日期都有誤植的現象，但若無法獲得文本的產生日期，就無法進行後續的研究分析，因此最終我們捨棄了 1997 年至 2000 年這段時間的發言紀錄。

發言人的講話來代表中國的國家身分？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分析層次的混淆，Thies（2009）劃分出三種分析層次，個人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的，本研究試圖以個人層次的身分去代表國家層次的身分，這是合理的嗎？Barnett（1993）曾討論過此種作法的適用性，認為國內的決策者要不是被國內和國際的環境限制住，就是會被他們社會化，因此國家層次的身分會是連續的，也就是個人與國家的身分會同步。此種作法已被許多研究驗證過，Wish（1980）發現同個國家的領導人與表現出來的國家身分相近，Breuning（1995）也發現雖然國內層次對於國家身分有爭議，但一旦上升到國家層次，決策者表現出來的國家身分就不再受黨派影響。本研究的資料來自於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直屬中國國務院，為正部級單位，其發言人的講話具有足夠代表性，可被視為決策者意志的展現，因此被用來代表中國之國家身分表達是合理的作法¹⁴。

第二個問題是，以關鍵字選出的文本，是否真能代表中國指稱自己的情況？以關鍵字篩選只能選出「提及」此兩辭彙的情形，可以進一步分成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明確指稱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或是大國，例如「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的發展中國家」；第二種是指涉發展中國家或大國這個群體，且中國被隱含於其中，例如「談判中必須切實解決發展中國家的關切」，這是關於 WTO 多哈回合談判（Doha Round）的發言，在這個情境下，由於中國在 WTO 的定義中明確屬於發展中國家，因此可以確認這是在指涉自己；第三種是指涉他國為發展中國家或大國，例如「俄羅斯是北極大國」。第一和第二種是指稱自己的情況，第三種則否，機器無法將第三種情況篩選掉，但經作者人工檢視，第三種情況的出現比例極低，不影響主題模型的分類以及後續的研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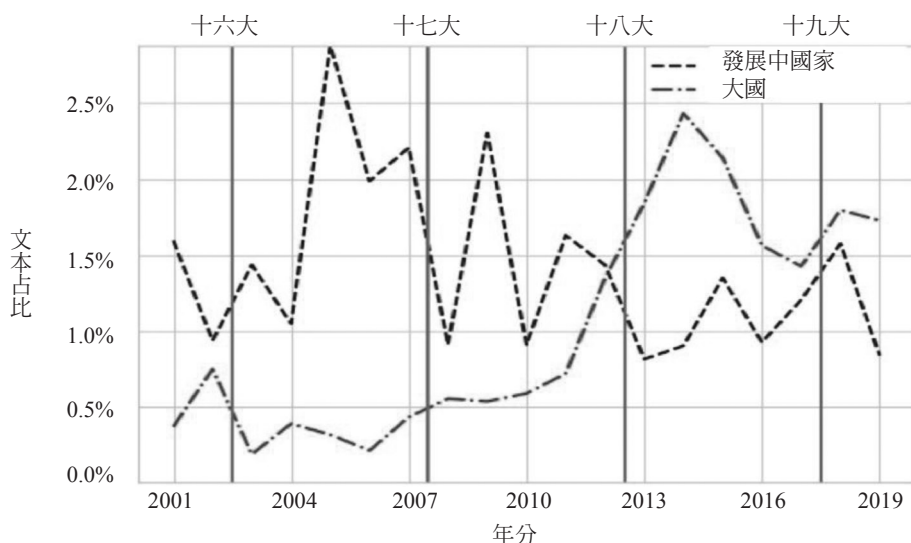
參、「發展中國家」與「大國」身分的消長

在本節我們將先回答第一個研究問題，透過經驗證據檢驗中國的跨時身分變化以及目前身分的狀態。我們做了身分關鍵字占比與年分的關係圖（見圖 1），橫軸是年分，縱軸是含有身分關鍵字的文本數量占該年總文本數量的比重，我們將兩個身分的跨時變化放在同一張圖上，做進一步分析。我們資料的時段是從 2001 年

註¹⁴ 除外交部發言人外，諸如外交部部長和常務副部長等職位的發言也足以作為中國之國家身分之展現，但考量資料的完整性、時間跨度以及可取得性後，本文全以外交部發言人之發言為主要分析對象。作者要感謝審查人之一對這個問題的提醒。

至 2019 年，橫跨了三個完整任期（胡錦濤兩任、習近平第一任）以及兩個不完整的任期（江澤民第二任、習近平第二任），因此分析主要會集中在胡錦濤的兩任（2003~2012）以及習近平第一任（2013~2017）之上。

圖 1 「發展中國家」與「大國」之占比比較（關鍵字文本數除以總文本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首先來看發展中國家身分的變化，除了在胡錦濤第一任期的尾聲到第二任初期（2005~2009）比重大幅成長外，其他時間都大約落在 1%~1.5% 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增減。我們閱讀這段時間的文本後，發現發展中國家身分的大幅成長可以約略歸因為三個因素，都與多邊組織相關。

一、是 2005 年的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報告書的提出，由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倡議包含擴大安理會在內的改革方案，該年的討論達到高峰，中國自然也不缺席於表達自身的立場，但最後改革仍沒有被大多數國家認可而胎死腹中。

二、是 2006 年在北京舉辦的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以及 2003~2007 年間舉辦的的八國集團同五國集團對話（G8+5）的持續舉行。前者原是持續性舉辦的多邊部長級會議，但 2006 年由於中國是主辦國，自然就要將原本就在強調的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大加發揚；後者則是原先由已開發國家所組成的八國集團認為全球問題需要

擴大參與，因此決定納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個發展中國家來一起商討，在這種場合，中國自然是需要更加突顯自身身為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以與八國集團區別開來。2008 年開始 G8+5 被 G20 峰會取代後，這種傾向也就跟著消失。

三、則是 2007~2009 年間國際氣候議題一時之間成為熱點，因為那時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所以各國必須於在氣候變化大會上產出一份新的協議以作為後續的規範，在 2007 年第十三屆會議上討論出了《峇里島路線圖》，並且在 2009 年第十五屆會議上產出《哥本哈根協議》，在這些新決議產生的過程中，中國作為氣候領域話語權最大的國家之一，自然會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積極發言。總體來看，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分，除了在 2005~2009 年這段時間由於政治、經濟、氣候的外交議題表態而比重上升外，其餘時間的出現頻率都十分穩定。

其次，我們觀察大國身分的變化。可以發現，在胡錦濤的第二任期（2007~2012）大國身分主要是緩慢上升，直到胡與習近平任期交接時才大幅上升，並且在習近平的第一任期（2013~2018）達到高峰後進入平穩高原期，這一個發展歷程符合我們對中國自認大國形象的瞭解。在 2008 年前後，西方遭受金融風暴打擊，而北京卻風光舉辦了奧運且 GDP 超日趕美之後，對自己的大國形象就開始有認知，體現在同時期中國央視製播的一系列〈大國崛起〉的影片，在影片中，中國不只想要理解過往大國是如何崛起的來作為自身的參照，更想理解既有大國是怎麼衰落的。同一時間，「中國夢」的講法在 2010 年前後首次出現於軍方背景人員所著書籍，中國對自己身為「負責任大國」的認知也愈來愈清晰，種種變化累積起來也慢慢浮現到官方的對外講話上。習近平上任之後，承接並發揚了這股轉變的動能，直接拉升到官方主旋律之上，對習來說，他的內在轉變驅動力是來自於中國歷史階段論，因為在習近平的任期之內，中國會跨過第一個百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過後，中國必然會產生質變，轉化成不同的狀態，這個狀態對習近平來說就是「大國」。中國的發展目標隨著這個狀態的變化而變化，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轉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帶動外交目標的轉變，從「和諧世界」轉變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並以「新型大國關係」作為具體指導原則。

但是這個氣勢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中國流露出的這些民族自信雖然鞏固了共產黨的執政正當性，是面向國內群眾的，但不免還是會出現一些副作用，其中之一是民族主義情緒被官方敘事拉動而停不下來，外溢於更強勁甚至更具侵略性的外交行為，這些行為再加上原本官方提倡的形象，在國外的觀眾看來是非常具有威脅性的，除了讓之前因為韜光養晦策略而沈寂一陣子的中國威脅論死灰復燃，也讓美國

認為中美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從歐巴馬政權的亞太再平衡到川普的印太戰略，都讓中國的外部壓力增加。因此，大國身分在 2015~2016 年間達到高峰後，慢慢退回較低比例的平穩高原期，並且也出現了一些對詞語的修飾和重新詮釋。綜上所述，大國身分在胡錦濤第二任期上升，在習近平第一任期達到高峰，並在 2016 年後穩定於 1.5% 附近徘徊。

最後我們將兩者整合起來看，首先發現，中國兩身分的消長可以約略分為兩個階段，以 2012 年為界，前期比較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後期則較強調大國的身分。第二，雖然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但如果細看第二個階段，就會發現除了一開始大國身分大幅衝高的幾年，後來發展中國家與大國身分的比例可以說是相當接近，而且幾乎同步起伏。第三，發展中國家身分結束爆發期的時間點大約在 2009~2010 年附近，但是大國身分開始爆發的時候約在 2012~2013 年間，且發展中國家身分爆發時大國身分沒有受到顯著影響，大國身分爆發時發展中國家身分也沒有顯著變動，因此可以推論兩個身分並非競爭關係。最後，我們以 2012 年為界分成兩個階段，分別檢驗兩身分文本占比的皮爾森相關 (Pearson's Correlation)，發現在兩階段中，兩身分文本占比皆為中低負相關 (-0.40; -0.24) 且相關性皆不顯著 ($p = 0.22$; $p = 0.57$)。綜合以上幾點，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身分和大國身分雖然有著階段性的消長，但是在這兩個階段中兩者並非互斥，也並沒有互相影響，我們認為中國對於兩個身分的使用的確在經驗上是共同存在的。

肆、共存身分的內在樣貌與使用情境

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之後，我們從經驗證據中可以發現中國的兩個身分是共存的，但是根據前人文獻，這兩個身分的概念也是有差異的，因此接下來我們將分別對包含「發展中國家」關鍵字的文本群和包含「大國」關鍵字的文本群建立各自的主題模型，藉由檢視兩身分的內在樣貌來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中國如何以時機和情境的區分，處理概念上不同卻共同存在的兩個身分？

一、主題模型與主題群^⑮

本研究產生的主題編號、主題標籤（人工辨識），及關鍵字見表 1、表 2^⑯。包含「發展中國家」關鍵字的文本中，共可分為 8 個主題：主題 1 是中國支持聯合國中的安理會改革；主題 2 是領導人行程的介紹；主題 3 主要在反對美國干預中國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主題 4 為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倡議，包含金磚國家、一帶一路等；主題 5 強調 WTO 需重視發展中國家權益，且國際經濟結構需要改革；主題 6 認為發達國家必須在氣候變遷問題中付更多的責任，且須遵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主題 7 在講與非洲國家、中東國家、東協國家的合作關係；主題 8 強調與美國（最大發達國家）以及印度（最大發展中國家）要一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表 1 「發展中國家」的主題列表

編號	主題標籤	共現詞
1	改革安理會	問題、聯合國、改革、支持、安理會、廣泛、代表性、達成、主張、立場
2	領導人行程	領導人、共同、主席、印度、八國集團、舉行、對話、協調、保持、總理

註⑮ 必須說明的是，「推動、積極、繼續、會議、希望、取得、實現、認為、貢獻、談判」這樣的組合，與「問題、聯合國、改革、支持、安理會、廣泛、代表性、達成、主張、立場」看起來似乎沒有很大區別。是以作者希望對於本研究的操作程序提出幾點補充說明：（一）電腦輔助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並非透過手動選取字詞，而是在建立涵蓋大量文本的資料庫之後，選擇建立模型的工具（以本文來說是 LDA），輸入關鍵字（例如「大國」），由電腦從海量資料中選取「與關鍵詞共同出現」（concurrency）頻率最高的字詞群，並由電腦建立主題群組，這是第一步驟。換言之，將巨量文本交由電腦判讀後，電腦將關鍵字共現詞中相關性最高的一些字詞放在一個叢集（即主題群組），這是演算法運算之後的結果，並非作者主觀判斷選取。電腦同時也會顯示關鍵字（例如「大國」）與這些共現詞同時出現頻率最高的文章（例如《人民日報》x 年 x 月 x 號 x 版 x 文章標題與全文內容）；（二）不能否認，在為這些主題群組設定標籤時（亦即出現這些詞的時候該文本的焦點為何），光是從這些共現詞中，有時候的確會出現難以判斷其具體類別的問題，這時就必須根據電腦所選出相關性最高的文章內容輔以人工判讀（實際閱讀文本）來協助訂立主題標籤，這是第二個步驟。本文於第四節第一小節已有對於各主題群的說明，敘述該主題出現之情境為何，並在後續文章中注重概念上的分類，也舉出具體文本脈絡支持這些主題類別；（三）換言之，共現詞為電腦演算字詞的共同出現頻率所挑選出來。主題標籤則是作者依據電腦演算的結果，透過閱讀文本後所訂立的類別標籤。

註⑯ 在本研究建立的「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兩組模型中，包含主題含量最高的十筆文本之資料請參考附檔四：<https://bit.ly/2KDiuVk>。

編號	主題標籤	共現詞
3	反對美國價值干預	國際、維護、人民、中國政府、堅持、面臨、人權、外交、作用、重大
4	區域性合作倡議	國家、經濟、金磚、合作，廣大、市場、建設、全球、開展、促進
5	多邊組織改革	推動、積極、繼續、會議、希望、取得、實現、認為、貢獻、談判
6	氣候變遷問題（發達國家負責）	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應對、原則、社會、國際、責任、共同、框架、減排
7	發展中國家合作	合作、加強、關係、非洲、雙方、領域、進一步、互利、政治、共同
8	世界和平穩定	世界、重要、和平、穩定、最大、地區、促進、有利於、利益、戰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包含「大國」關鍵字的文本中，也分為 8 個主題：主題 1 是在說明中國與區域強權（例如：美國、俄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等）建立雙邊關係，提出共同關注的問題和利益；主題 2 強調中國維護並支持多邊組織，且擔當起大國責任；主題 3 說明與全球強權（主要是美國）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雙邊關係（為新型國際關係的內涵）；主題 4 提及中國在次領域（如能源、經濟、非典型安全等）中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主題 5 強調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協商、積極履行多邊協議、積極負責並發揮建設性作用；主題 6 是關於地區的和平穩定，主要是鄰近的區域包含朝鮮半島、南海，以及亞太地區等，並且強調中國在區域的影響力以及責任；主題 7 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念闡述；主題 8 是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美國互動。

表 2 「大國」的主題列表

編號	主題標籤	共現詞
1	大國會談（區域強權）	重要、雙方、共同、問題、領導人、保持、溝通、全面、深入、共同利益
2	支持多邊組織	國際、問題、安全、社會、聯合國、全球、責任、主張、成為、強調

編號	主題標籤	共現詞
3	大國關係（全球強權）	關係、中美關係、兩國、中美、共識、構建、分歧、戰略、雙方、相互尊重
4	次領域合作（能源、經濟、安全等）	合作、加強、領域、進一步、兩國人民、互利、能源、深化、原則、高度重視
5	參與多邊協商、履行多邊協議	國家、積極、負責、作用、繼續、發揮、應對、建設性、努力、氣候變化
6	區域和平穩定	穩定、和平、維護、地區、美國、希望、利益、有利於、符合、認為
7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世界、外交、共同、堅持、促進、和平、基礎、人民、影響、國家
8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推動、對話、主席、習近平、建設、總統、取得、經濟、推進、互信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表 1 和表 2 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與「大國」的 8 個主題有一些重複性存在，意即被談論的概念是相近的。我們將兩個身分中相似的主題分別抓出來，合併成若干個「主題群」（見表 3）。

表 3 同主題群的「發展中國家」與「大國」概念比較。

	「發展中國家」身分	「大國」身分
A 類：雙邊外交關係	主題 2（領導人行程） 主題 4（區域性合作倡議） 主題 7（發展中國家合作）	主題 1（大國會談） 主題 3（大國關係） 主題 4（次領域合作） 主題 8（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B 類：維護和平穩定	主題 8（世界和平穩定）	主題 6（區域和平穩定）
C 類：多邊組織與議題	主題 1（改革安理會） 主題 5（多邊組織改革） 主題 6（氣候變遷問題）	主題 2（支持多邊組織） 主題 5（多邊協商與多邊協議）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 類主題群是有關中國雙邊外交關係的主題集合，這一類主題主要在談論中國以國家為單位和其他國際行為者所進行的互動，包含「發展中國家」身分中的中國

領導人的出訪行程（主題 2）、中國主導的區域性或目的性合作倡議（主題 4）、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邊關係（主題 7），以及「大國」身分中的與區域強權的交往（主題 1）、中美關係（主題 3、8）、跟多國在次領域上的合作（主題 4）。B 類主題群中國主要在強調要維護和平及穩定，談論的是對中國外部環境的期待，包含發展中國家身分中的追求世界層次的和平穩定（主題 8）以及大國身分中的追求特定地區和平穩定（主題 6）。

C 類主題群則是有關中國在多邊組織與議題中的態度與立場，包含發展中國家身分中的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主題 1）、推動經濟多邊組織的改革（主題 5）、批判國際氣候變遷議題中不合理的現象（主題 6），以及大國身分中的支持多邊組織（主題 2）和參與多邊協商及履行多邊協議（主題 5）。在上述被歸類進各主題群的主題之外，另有兩個主題談論的內容沒有對應，分別是發展中國家身分中的反對美國價值干預（主題 3）以及大國身分中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主題 7）。

二、A類主題群（雙邊外交關係）：對象差異

首先，A 類主題群是與別的國家、或是與跨國家組織建立關係的一些談話，例如在「發展中國家」身分下，主題 4（區域性合作倡議）占比最高的發言在談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談論的對象是金磚國家、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國家，主題 7（發展中國家合作）占比前三高的發言分別是在講與沙特（沙烏地阿拉伯）、非洲國家和東盟（東協）過去的合作成果以及未來的合作目標，談論的對象顯然也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例如主題 7 占比最高的一段發言（以下粗體皆為筆者所加）：

沙特是中東的一個重要國家，中國是亞洲的一個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在很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有共同的想法。對在當今的國際秩序中，如何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雙方也有著一系列的共識……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6 年 01 月 24 日）

蒲曉宇（2014）曾提及，中國需要以低姿態（發展中國家身分）來獲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支持以及好感度，其實就是中國自毛澤東時代起就在提倡的「南南合作」（鄧小平 1974）。此概念是建立在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之下，一邊是殖民者、壓迫者的發達國家，另一邊是被經濟剝削的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作

為一個共同體，應該也必須聯合起來對抗「敵人」。這個意識形態傳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起，就一直深深烙印在中國的外交思想當中，不僅體現在中國在各個多邊組織中的立場中，包含政治上的萬隆會議、經濟上的七十七國集團和金磚四國（BRIC），以及氣候問題上的基礎四國（BASIC）等等，也在雙邊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是中國長期以來都花費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心力經營與亞洲、非洲以及太平洋小島國家的關係，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也都是打著南南合作的旗號在進行的，雖然不可否認地這其中一定有自身的戰略和經濟考量存在，但是意識形態在其中的影響也不可忽視。

相對地，當中國以「大國」的身分談及合作與交往的概念時，對象卻變成了其他大國或崛起中大國。作者檢視相關文本後發現，主題 1（大國會談）占比前三高的發言對象都是美國，主題 3（大國關係）發言占比前三名也是由美國、俄羅斯包辦，前十名則是由美國、俄羅斯、印度包辦，皆為描述雙方的關係以及展望未來的相處模式。例如主題 1 占比最高的一段發言：

但是肯定會有涉及中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也會有涉及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共同關心的國際熱點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17 年 06 月 16 日）

Zeng 和 Breslin（2016）告訴我們，在中國的語境中，美國、俄國、印度剛好是三個最被中國內部認定符合「大國」資格的國家（即便中國內部對大國的定義沒有共識）。中國大國身分的重要性在胡錦濤時代的「全方位外交」，到被習近平繼承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句總結說明得很清楚：「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羅建波 2017）。可見，雖然每個對象都有被提及，但放在最前面的大國外交占有絕對重要性。中國內部也曾出現對中國參與「大國協調」機制的討論（鄭先武 2013；韓愛勇 2013），認為大國協調可作為既有國際安全機制的補充，雖然討論的範圍僅限於東亞區域，但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提昇，這或許也是中國前進 G7 的一個試探倡議。

在 A 類主題群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以不同的身分與不同的對象對話。當發言的對象為發展中國家時，用發展中國家的身分；發言的對象為大國時，就用大國的身分。我們更進一步猜想，這個指涉對象不同的情況是否不只在特定的主題群中體現，而是包含所有以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的發言？

為了證實這個猜想，我們分別以「美」、「俄」來代表對話對象中的大國，以及「非洲」來代表對話對象中的發展中國家，原因在於這些群體相當具有代表性，

不只在中國視角下他們分別代表大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大部分的客觀定義之下這些國家也都符合這個分類標準。接下來，我們檢驗他們在中國以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發言時的相對出現比例（見表 4）。

表 4 「美」、「俄」、「非洲」分別在「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發言下的出現比例比較

	「發展中國家」身分	「大國」身分
「美」	14.73%	45.35%
「俄」	1.72%	11.39%
「非洲」	11.29%	1.52%

註 1：若字詞「美」出現在文本中的任何一處，該文本之對話對象即被判定為美國，「俄」即被判定為俄國，至於被判定為非洲的字詞則為「非洲」和「中非」。雖然此方法可能會有選取範圍與概念範圍不符的問題，但經研究者檢視，總體來說選取範圍已足夠精確。

註 2：表格中的百分比為某對話對象出現在某身分的所有文本中的比例，例如在「發展中國家」身分的文本群中，對話對象為美國的文本占了 14.7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結果顯示，代表大國的「美國」在發展中國家身分的文本中被提及的比例是 14.73%，在大國身分的文本中被提及的比例是 45.35%，後者為前者的 3 倍有餘；至於「俄國」則分別是 1.72% 和 11.39%，後者比前者高出了 5.5 倍。反過來看，代表發展中國家的「非洲」在發展中國家身分下被提及的比例是 11.29%，大國身分下則只有 1.52%，前者比後者高出了近 6.5 倍。這證實了我們的猜想：中國面對不同的對象會傾向以不同的身分發言。

三、B類主題群（維護和平穩定）：指涉範圍與態度差異

再來，我們觀察 B 類主題群，談論焦點主要是圍繞在外部環境的和平與穩定上。從「發展中國家」身分的主題 8（世界和平穩定）占比前十名的發言可以看出，在談論此類主題時，都是以「世界範圍」的和平與穩定作為與某國雙邊關係的期許，認為兩國的合作與友好是達成世界和平穩定的關鍵，但此目標相對空泛、不明確，例如描述中美關係的占比最高的發言：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

大的發達國家和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無論是出於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利益，還是為了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我們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期待和相信中美雙方能夠共同努力，確保中美關係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穩定發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5 年 06 月 07 日）

相對地，在「大國」身分的主題 6（區域和平穩定）中，占比前十名發言指涉的「範圍」幾乎都非常明確，五次是亞太地區、三次是朝鮮半島、一次是南海，都是中國的周邊地區。

除了「範圍」的差異，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差異是發言的「態度」。如前所說，中國在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提到世界範圍的和平與穩定時，多為空泛的期許，處於試圖增進彼此關係的情境之中，因此態度是相當正面的。反之，在用「大國」身分的時候，提及的和平與穩定不再是虛無的「世界」，而是與中國利益特別相關的「周邊地區」（Nathan and Scobell 2015），例如有核威脅的朝鮮半島、存在主權爭議的南海地區以及與美國對抗日益增強的西太平洋。因此，中國在提及要維護這些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時，態度顯現為更加堅定、強硬（assertive），並不吝展現自己在此區域的主導姿態「敦促他人」，同時批判性也更強、往往話中帶刺。我們分別以中國在亞太地區、朝鮮半島、南海占比最高的發言為例：

同時，為了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中國軍隊需要更新一些武器裝備，這無可厚非。任何製造和渲染中國軍事威脅的言行都不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希望美方尊重事實，多做有利於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有利於亞太各國增信互信，有利於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5 年 06 月 07 日）

中方一直認為，妥善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有關問題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當前形勢下，有關各方應著眼大局，多做有利於局勢緩和的事，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14 年 03 月 26 日）

有關部署不針對任何國家。無心侵犯者無需擔憂害怕。希望有關方面客

觀、冷靜看待。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是貿易大國，也是地區和平穩定的堅定維護者。中國將繼續同各國通力合作，維護好南海地區的和平穩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18年05月03日）

爲了驗證我們對於不同身分表現出不同態度的觀察，我們進一步將 82 筆「發展中國家」主題 8（世界和平穩定）占比最高的文章，以及 76 筆「大國」主題 6（區域和平穩定）占比最高的文章以大連理工大學建置的「中文情感詞彙本體庫」分類^⑰，將情緒分爲樂、好、怒、哀、懼、惡、驚等七大類，並將「怒、哀、懼、惡」等四類歸類爲負面情緒，用以檢驗負面情緒在兩身分的文本中被提到的比例是否有差異^⑱。結果顯示，在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之下，出現負面情緒字詞的比率爲 0.59%（負面情緒字詞在所有文本字詞中占的比例）。相對地，在大國的身分之下，出現負面情緒字詞的比例則達到 1.21%，爲前者的兩倍。除了負面情緒占所有文本字詞的絕對比例外，我們也檢驗其在所有情緒字詞中的相對比例（負面情緒字詞在所有情緒字詞中的占比），結果發現，在發展中國家身分下，負面情緒字詞的相對比例爲 4.45%，大國身分則爲 8.85%，後者一樣爲前者的將近兩倍。

由此可見，在 B 類主題群中，當中國以大國的身分講話時，會比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講話高出一倍左右的負面情緒^⑲。這個發現可以與關於中國外交行爲和語言上是否在 2010 年後轉爲更加強硬的文獻做對話，例如 Johnston（2013）指出中國並沒有全面性地變得更加強硬，而是要區分不同的領域和事件；He 和 Feng（2012）則認爲「核心利益」與否是中國外交行爲和語氣差異的關鍵。本文的結果同樣顯示，中國會對不同的指涉主體，以及以不同的身分表現出不同的情緒，在以大國身分談及周邊地區時（更有可能是其核心利益），中國的語氣就更爲負面，反之，以發展中國家身分指涉全球範圍時，語氣就相對正面。

四、C類主題群（多邊組織與議題）：立場差異

最後，C 類主題群是有關於多邊組織、多邊協議以及國際秩序的發言。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提出「改革多邊組織、修正國際秩序」的倡議，以大國的身分展

註⑰ 本文使用大連理工大學的中文情感詞彙本體庫，檔案來源：<http://ir.dlut.edu.cn/EmotionOntologyDownload>，於 2020/03/21 取用。

註⑱ 本文並未計入情緒字詞的強度（intensity），所有情緒字詞的強度皆預設爲 1。

註⑲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結果並不適用於 A 類和 C 類主題群、也不能推論至兩身分的整體發言。在其他情境中，以情緒測量出的兩身分態度差異都不明顯。

現「支持多邊組織、遵守國際秩序」的姿態。

以「發展中國家」為身分的這個倡議，基本上就是中國自鄧小平以來的外交目標，也就是所謂的「建立國際新秩序」（鄧小平 1993, 281）。這個目標包含兩個面向，分別對應鄧小平所提出的兩個主要矛盾，也就是「東西（和平）問題」以及「南北（發展）問題」。東西問題是指當時美蘇兩個霸權主義國家在擴張勢力、引發戰爭，解決方法是「和平共處五原則」^②，是為國際新秩序中的政治新秩序；至於南北問題則是指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發展不均，解決方法為「自力更生」、「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鄧小平 1993, 3, 19, 56），構成國際新秩序中的經濟新秩序。

至於「大國」身分所表現出來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正面姿態，則是源自諸多建構主義學者觀察到的中國在 1990 年代起明顯的被國際社會社會化的過程（Johnston 2008; 張春滿 2014），以及 2000 年代起開始採用的「負責任」論述（吳兵 2015; 趙洋 2017）。表現除了是中國精英對於現有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事實上」促進加速了中國發展的認可（Zeng and Breslin 2016）。

這兩個身分的兩種論述是彼此矛盾的，一個表達對現有秩序的不滿，想以「新」秩序取代之或修正之，另一個則傾向認可現有秩序、積極融入。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在經驗證據中，兩個身分的中國分別怎麼說。我們首先來看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分下 1（改革安理會）、5（多邊組織改革）、6（氣候變遷問題）三個主題最高占比的發言：

關於聯合國改革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中方支援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增強安理會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能力，提高安理會的效率，維護安理會的權威。安理會的擴大應優先解決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5 年 04 月 12 日）

我們認為談判中必須切實解決發展中國家的關切，給他們以必要的特殊與差別待遇……我們認為杜哈回合談判應該是發展的回合，必須確保以發展為主題，切實推進貿易自由化的進程，實質上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入機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5 年 12 月 13 日）

註② 和平共處五原則由周恩來 1953 年會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包含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

氣候變化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排放造成的，目前溫室氣體的積累排放中有 80% 是發達國家造成的……關鍵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該履行他們作出的承諾，一方面採取切實行動來制訂並實現中期減排目標，另一方面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援，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9 年 12 月 01 日）

三個主題分別對應三個領域：政治、經濟、氣候。主題 1 的場景是聯合國的安理會，中國訴求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改革既有的多邊權力結構。主題 5 的場景是 WTO 和 IMF，中國的訴求仍是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以及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的分量、發言權，試圖改變發展中國家被「經濟殖民」的困境。主題 6 則是針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的回應，認為氣候變遷這個議題，該負起歷史責任的是發達國家，應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指導，由發達國家率先減排，並提供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是氣候上受害者、經濟上的受壓迫者（經濟果實都被西方、北方國家享用），不應被要求付出更多。可見，當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身分發言時，表達的是對現有國際組織和秩序的不滿，要求解決發展中國家這個群體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情況。

再來看「大國」身分下的中國是怎麼談的，以下是主題 2（支持多邊組織）最高占比的發言以及主題 5（多邊協商與多邊協議）最高、次高占比的發言：

中方的立場是，二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以聯合國為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是當今世界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最關鍵要素。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堅定奉行多邊主義政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17 年 06 月 15 日）

有些議論稱中國加入世貿後沒有完全履行承諾，這種說法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實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以非常認真負責的態度履行了承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具體來說……加入世貿有助於實現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目標，同時也是中國政府面對全球化浪潮所做出的戰略性決策，符合我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03 年 09 月 08 日）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堅定，措施有力，成就舉世矚目。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採取切實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治理，為推動《巴黎協定》的達成和生效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和貢獻……中國將繼續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百分之百承擔自己的義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017 年 06 月 02 日）

電腦選出兩個主題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篇講話，剛巧也對應到多邊組織、國際秩序中的政治、經濟、氣候三個次領域，與發展中國家身分的發言做個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以大國身分談聯合國時，不談改革只談遵守，只談擁護聯合國核心甚至稱其為國際秩序的「基礎」。談 WTO 時，不談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或是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只談多麼負責、降了多少關稅、有計劃的推進法令修正，重點在強調履行協議以及堅守多邊主義的決心。在氣候問題上，不指責發達國家獨享經濟成果和氣候代價的分配多麼不均，而是強調自己的負責任與積極性，宣揚自己按多邊協議承擔了多少義務甚至加碼「自主貢獻」。

綜上所述，按照次領域把兩個身分的發言對照起來看，可以發現在 C 類主題群中，雖然談論的內容都與多邊組織和議題相關，但是中國的兩個身分卻表達出了完全相反、矛盾的論述：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抵制現有的多邊架構，卻以大國的身分表達出合作的態度。

五、小結與討論

本節我們回答了本文提出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將兩個身分拆解成各八個主題，再聚合成為三個相對應的主題群，攤開來檢視其樣貌。我們發現，A 類主題群（雙邊外交關係）的差異體現在指涉對象上，中國會選擇以適當之身分提及與他者的關係。本文的發現部分支持了蒲曉宇所言之觀眾差異是中國釋放出不同地位訊號原因的論點，兩者都認為中國對不同的對象表現出不同的樣貌以降低衝突感，但是本文之發現與蒲文的結論不同之處在於，本文所謂的「觀眾」的差異來源不是如蒲文所提之國內和國外觀眾，而是不同的國外國家群體。本文可以補充蒲文的地方在於，本文發現中國對於國外的觀眾所表現的樣貌不是單一的，並非如蒲文所言，中國都是想要以發展中國家的姿態面對國外的觀眾。本文認為，中國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確如蒲曉宇所說，會強調第三世界的共同體以及對應的南南合作傳統，但是中國在面對所謂的大國時，也會彈性地將自己的身分轉換為大國以謀求與目標觀眾之共同點和親近性。

B類主題群（維護和平穩定）的差異體現在指涉主體之範圍以及談話態度之上，中國不同身分所強調的重點與表達的情緒值都不盡相同。我們發現，當中國指涉明確的周邊地區時，更會強調自己的區域大國身分，也更有可能使用負面語氣，反之，當指涉模糊的世界範圍時，中國傾向以發展中國家的姿態出現，語氣也相對正面。可以看到，在區域議題上，中國的大國身分已成為宣示影響力的象徵，同時也成為傳達負面情緒的媒介。C類主題群（多邊組織與議題）的差異最為尖銳，中國以不同的身分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矛盾主張，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質疑多邊組織和現有國際秩序，但卻以大國的身分擁抱支持之。

伍、結論與未來發展

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提昇，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對於自我身分的定位已經從以往的「發展中國家」，慢慢地往「大國」傾斜。有些學者推論這個轉變更接近一個階段式的典範轉移，但同時也有許多文獻主張，這兩個身分常常以某種形式交融在一起。中國對自身的自我定位到底實際情況如何？又為何得以發生？這些困惑是本文的出發點。

我們首先檢驗近二十年的中國對外公開發言，發現中國自稱為「發展中國家」和「大國」的情況雖然有出現比例上的翻轉，但是並不是互斥的，也沒有取代的情形發生，因此說明了兩種身分的共同存在。接著我們以主題模型分析中國的兩個身分，描繪出兩者的特徵，並在進一步分組比較之後，發現雖然兩個身分提及的概念內容有共通性，但是卻會在不同的時機和情境下使用。當中國面對不同對象、指涉不同區域範圍、展現不同情緒、以及表達不同立場時，會有使用不同身分的傾向。

本文的貢獻有三：一是提供了中國「發展中國家」和「大國」身分共同存在的經驗證據；二是描繪出中國兩個身分的特徵，得以更細緻地檢視之；三是觀察到並擴展中國使用不同身分的時機和情境。基於以上發現，在未來我們將可以更好地預測中國在什麼情況下會採用何種身分，對該身分框架出的有限行為做出合理的回應與判斷。同時，我們也認為既然中國擁有在不同情境下展現不同身分的彈性與需求，意味著兩個身分並存的情形在可見的未來很有可能延續下去。

本文是一個描述性的探索型研究，雖然對中國的特定身分在縱向的跨時變化、橫向的關聯性之間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卻較沒有辦法回答因果性的問題。例如，中國各身分形成的原因為何？為什麼在某情境下選擇某特定身分？是受到經濟

或軍事等物質力量的影響，還是被歷史遺產和民族情感所驅使？是被少數政治精英的心理特質所左右，還是在與外部行為者互動的過程中慢慢成形？又例如，中國的身分與其實際外交政策的相關性為何？話語和行為的一致性真的適用於中國身上嗎？這些問題都有待後續的研究回答。

* * *

(收件：109 年 11 月 13 日，接受：110 年 7 月 9 日)

“Developing Country” or “Great Power”? Understanding China’s Two-Faced Self-Identification

Chia-hao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Si Wan Colleg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Xuan-li R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sharp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state power,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China’s self-identification has shifted from “developing country” to “great power.”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this is akin to a paradigm shift. Others disagree, believing that China mingles the two identification labels. What really is China’s self-identification label(s)? In what different context does China use these labels? These are two questions the authors try to answer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construct a database from the daily briefings of the Spokesperson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om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from 2001~2019. We then apply the Computer-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data and build topic models. Our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e empirically verify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elf-identifications: developing country and great power; (2) we are able to locat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wo self-identifications; (3) we are able to observe the timing and situations where China uses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labels. The implication for this research is that we are now much better equipped to make an estimation on where and when China will us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labels, and in turn make reasonable responses. We also believe that since China can demonstrat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labels with reasonable flexibility, we have good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use and coexistence of two self-identifications will continu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 Self-Identification Label, Computer-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 Topic Modeling

參考文獻

- 王毅，2014，〈外交部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x_673089/zyjh_673099/t1135388.shtml，查閱時間：
2020/03/17。Wang, Yi. 2014. "Waijiaobu buzhang wangyi jiu zhongguo waijiao zhengce
he duiwai guanxi huida zhongwai jizhe tiwen" [Wang Yi Briefs the Media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Accessed on March 17, 2020).
- 王緝思，2011，〈中國的國際定位問題與「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國
際問題研究》，2011 (2)：4-9。Wang, Ji-si. 2011. "Zhongguo de guoji dingwei wenti
yu 'taoguang yanghui, yousuo zuowei' de zhanlue sixiang"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of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Principle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While Getting Something
Accomplish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1 (2): 4-9.
- 朱鋒，2008，〈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之間求平衡〉，《現代國際關係》，
9：27-28。Zhu, Feng. 2008. "Zai 'taoguang yanghui' yu 'yousuo zuowei' zhijian
qiu pingheng" [Balancing between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Getting Something
Accomplishe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27-28.
- 吳兵，2015，〈從「天下責任」到「負責任大國」：身分視角下的中國國際責任觀歷史
嬗變研究〉，《當代亞太》，4：93-127。Wu, Bing. 2015. "Cong 'tianxia zeren' dao
'fuzeren daguo': shenfen shijiao xia de zhongguo guoji zeren guan lishi shanbian yanjiu"
[From "Heavenly Responsibility" to Responsible Great State: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View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rom an Identity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4: 93-127.
- 李少軍，2012，〈論中國雙重身分的困境與應對〉，《世界經濟與政治》，4 (1)：4-20。
Li, Shao-jun. 2012. "Lun zhongguo shuangzhong shenfen de kunjing yu yingdui" [China's
Dual-Identity Dilemm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1):
4-20.
- 阮宗澤，2020，〈深刻領會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國際問題研究》，
1：3。Ruan, Zong-ze. 2020. "Shenke linghui Xi Jin-Ping waijiao sixiang de lilun yu
shijian yiyi" [Thorough Grasp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1: 3.
- 邵軒磊，2019，〈機器學「習」：以文字探勘法探索習近平時期之大外宣戰略〉，《中
國大陸研究》，62 (4)：133-157。Shao, Xuan-lei. 2019. "Jiqi xue 'xi': yi wenzi tankanfa
tansuo Xi Jin-Ping shiqi zhi dawaixuan zhanlue" [Machine Learning: An Application of

- Text Mining to Xi'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Strate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2 (4): 133-157.
- 胡錦濤，2012，〈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北京：人民出版社。Hu, Jin-tao. 2012. *Jianding buyi yanzhe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daolu qianjin wei quanmian jiancheng xiaokang shehui er fendou* [Firmly March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張春滿，2014，〈從全面去合法性到選擇性嵌入：冷戰後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態度變遷及其解釋〉，《當代亞太》，3：27-46。Zhang, Chun-man. 2014. "Cong quanmian qu hefaxing dao xuanzhexing qianru: lengzhan hou zhongguo dui guoji zhixu de taidu bianqian jiqi jieshi" [From Comprehensive Legitimacy to Selective Embedme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ttitude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Following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3: 27-46.
- 習近平，2017，〈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1：33-52。Xi, Jin-ping. 2017. "Juesheng quanmian jiancheng xiaokang shehui duoqu xin shidai zhongguo tese shehui zhuyi weida shengli: 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 shijiu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shang de baogao"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11: 33-52.
- 陳和香，2014，〈毛澤東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比較研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Chen, He-xiang. 2014.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guoji zhanlue sixiang bijiao yanjiu". Shanghai: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雷建鋒，2019，〈國家身分、現代化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教學與研究》，5：9。Lei, Jian-feng. 2019. "Guojia shenfen, xiandaihua yu zhongguo tese daguo wajiao"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and Research*, 5: 9.
- 蒲曉宇，2014，〈地位信號、多重觀眾與中國外交再定位〉，《外交評論》，2：23。Pu, Xiao-yu. 2014. "Diwei xinhao, duozhong guanzhong yu zhongguo wajiao zai dingwei".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 23.
- 趙洋，2017，〈交往行動、戰略對話與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世界經濟與政

- 治》，2：77-105。Zhao, Yang. 2017. “Jiaowang hangdong, zhanlue duihua yu zhongguo fuzeren daguo shenfen jiangou” [Communicative Action, Strategic Dialogu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dentity as a Responsible Power].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77-105.
-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Zhao, Zi-yang. 1987. “Yanzhe you zhongguo tese de shehui zhuyi daolu qianjin: zai zhongguo gongchandang di shisan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shang de baogao” [March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ort to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鄧小平，1974，〈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4月11日。Deng, Xiao-ping. 1974.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daibiaotuan tuanzhang Deng Xiao-ping zai lianda di liu jie tebie huiyi shang de fayan” [Speech by Chairman of the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ng Xiaoping, at the Six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People’s Daily* (April 11).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Deng, Xiao-ping. 1993. *Deng Xiao-ping wenxuan: di san jua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3)].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鄭先武，2013，〈東亞「大國協調」：構建基礎與路徑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5：112。Zheng, Xian-wu. 2013. “Dongya ‘daguo xiediao’: goujian jichu yu lujing xuanze” [Constructing a Concert of Powers in East Asia: Normativ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5: 112.
- 韓愛勇，2013，〈東北亞大國協調與複合型安全合作架構的建立〉，《當代亞太》，6：43。Han Ai-yong. 2013. “Dongbeiya daguo xiediao yu fuhexing anquan hezuo jiagou de jianli” [Coordina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x Security Cooperation Framework].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6:43.
- 羅建波，2014，〈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身分定位與大國責任〉，《西亞非洲》，5：28-45。Luo, Jian-bo. 2014. “Fuzeren de fazhanzhong daguo: zhongguo de shenfen dingwei yu daguo zeren” [The Responsible Developing Big Power: China’s Identity and It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West Asia and Africa*, 5: 28-45.
- 羅建波，2017，〈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理念、新戰略與新特色〉，《西亞非洲》，4：28-49。Luo, Jian-bo. 2017. “Zhongguo tese daguo waijiao: xin linian, xin zhanlue yu xin

- tese”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Concepts, Strategy and Characteristics]. *West Asia and Africa*, 4: 28-49.
- Allan, Bentley B., Srdjan Vucetic, and Ted Hopf. 2018.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s Hegemonic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2 (4): 839-869.
- Barnett, Michael. 1993. “Institutions, Roles, and Disorder: The Case of the Arab States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 (3): 271-296.
- Blei, David M., Andrew Y. Ng, and Michael I. Jordan. 2003.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3 (Jan): 993-1022.
- Boon, Hoo Tiang. 2018. *China’s Global Identity: Consider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reat Pow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Breuning, Marijke. 1995. “Words and Deeds: Foreign Assistance Rhetoric and Policy Behavior in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9 (2): 235-54.
- Catalinac, Amy. 2016. “From Pork to Policy: The Rise of Programmatic Campaigning in Japanese Elections.” In Pekkanen Robert, ed.,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in Japan*, pp. 882-917. Boston: BRILL.
- Chen, Dingding, 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14.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 (3): 176-183.
- Chen, Titus C., and Chia-hao Hsu. 2018. “Double-Speaking Human Rights: Analyzing Human Rights Conception in Chinese Politics (1989~20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534-553.
- Freeman, Chas W. 2020. “China’s 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C Grand Strategy.” In David Shambaugh, ed., *China and the World*, pp. 37-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o, Qi. 2015. “China Debates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 (4): 349-70.
- He, Kai, and Huiyun Feng. 2012.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9 (5): 633-644.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8.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4): 7-48.
- Nathan, Andrew J., and Andrew Scobell. 2015.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u, Xiaoyu. 2019.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 Margaret E., Brandon M. Stewart, and Dustin Tingley. 2019. "Stm: An R Package for Structural Topic Model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91 (2): 1-40.
- Röder, Michael, Andreas Both, and Alexander Hinneburg. 2015. "Exploring the Space of Topic Coherence Measures." In Xueqi Cheng, ed.,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pp. 399-408.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Shambaugh, David. 2011.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4 (1): 7-27.
- Shambaugh, David. 2020. "China's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In David L. Shambaugh, ed., *China and the World*, pp. 3-25.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zuki, Shogo. 2014. "Journey to the West: China Debates Its 'Great Power' Identity." *Millennium*, 42 (3): 632-650.
- Swaine, Michael D., Rachel Esplin Odell, Luo Yuan, and Liu Xiangdong. 2013.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Thies, Cameron. 2009.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https://myweb.uiowa.edu/bhlai/workshop/role.pdf> (March 17, 2020).
- Vucetic, Srdjan. 2017.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Jianwei. 2019.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5): 15-30.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sh, Naomi Bailin. 1980. "Foreign Policy Makers and Their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4 (4): 532-554.
- Wu, Xinbo. 2001.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7): 293-301.

- Xinhua. 2009. "Wen Rejects Allegation of China, US Monopolizing World Affairs in Future." *Xinhua* (May 21).
- Yan, Xuotong. 2014.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7 (2): 153-184.
- Zeng, Jinghan, and Shaun Breslin. 2016.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 G2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 (4): 773-794.
- Zeng, Jinghan. 2016.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The State of Debate in China (1998~201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 (2): 422-442.
- Zhao, Suisheng. 2015. "China's Power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 A Developing Country versus a Great Power." In J. H. Chung ed., *Assessing China's Power; Asan-Palgrave Macmillan Series*, pp. 251-27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US.